

北宋诸儒《易》学观

李祥俊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北宋时期,《易》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解说与评价《易》成为儒学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北宋诸儒有关《易》学的总体评价很多,内容涉及《易》道总评、作者辨正、学派论衡、通经致用等各个层面,对汉唐《易》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了怀疑与修正,同时也结合时代思潮对《易》做出了新诠释,从中可以透视出北宋《易》学的内在演变轨迹。

关键词:北宋;儒家;《易》学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6)01-0034-05

The neo-Confucianists' views on Yi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 Xiang-ju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690-1279), studies of the Yi exerted extensive influences in both the society and academic circle, then interpreting and commenting the Yi became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The neo-Confucianists engaged diverse studies on the Yi, which relate to various layers including general comments, discrimination of the authors, balance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and statecrafts by Yi. They raised some doubts about some views in the Han (206BC-220AD) and Tang (618-907) Yi studies and made some rectifications, and offered new interpretations by the trend of thought at that time as well by which we could clearly see the internal evolution track of the Yi studie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fucianism; Yi studies

北宋时期,《易》作为传统的五经之一,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解说和评价《易》,成为北宋新儒学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北宋诸儒有关《易》学的总体评价很多,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易》道总评、作者辨正、学派论衡、通经致用等各个层面,对这些内容加以系统考察,有助于梳理清楚北宋《易》学的发展脉络。

一、《易》道总评

北宋时期,出于应对佛、道二教挑战建构自身形上学的需要,《易》之道受到儒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从传统的五经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北宋新儒学的核心内容。但这种转变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北宋前期的士大夫眼里,《易》虽然在儒家经典中以形上学见长,但还远不能与佛教哲学相比,活跃于宋太宗朝的文学名臣宋白就说:“若夫括天地,极阴阳,穷吉凶,审消长,莫尚乎《易》,而伏牺始之,仲尼述之,是垂美利于天下也。以日系月,彰往考来,正王道,纪人伦,莫尚乎《春秋》,……殊不知垂褒贬之文,不能等冤亲,齐生灭;究否泰之术,不能畅妙性,括真机。其为人天之津蹊,越生死之渊奥,则大雄氏

收稿日期:2005-11-09

作者简介:李祥俊(1966—),男,安徽合肥人,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出版专著《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等多部,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之法,莫不大乎,莫不圣乎。”(卷五七《建传教院碑铭》)^[1]但经过北宋诸儒的创造性诠释,到了两宋之际,《易》之道受到高度推崇,胡寅就很自豪地宣称:“自将《周易》规儿辈,白马空传一藏经。”(第112页)^[2]

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还就《易》在经书中的地位作了评述,把《易》从六经、五经中凸显出来是当时的一个趋势。北宋前期的儒学名臣杨亿就认为《易》经远高于其他五经,《易》达性命之理,而其他五经只是这一根本之理的体现,相互之间是本末、体用的关系,他说:“盖夫《易》者,世历三古,人更三圣。达性命之际,通神明之德,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之道几乎息矣。若乃《春秋》、《诗》、《书》、《礼》、《乐》,犹五行之更用事,而《易》为之原。”(卷二九四《送进士陈在中序》)^[1]程颢也推尊《易》学,他说:“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第13页)^[3]程颢等北宋新儒学的根本学术旨趣是建构儒家的形上学,所以才会特别尊《易》而相对忽视《诗》、《书》,这一点也正是儒家经学由尊五经向尊四书的范式转换的根本原因。

对于《易》的价值,北宋诸儒也有论列。“宋初三先生”中的石介批评老庄道家的自然无为论,认为《易》是一部救世之书,不得不作,也不能不作,他说:“以谓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机,为始兆乱者。吁,可怪也!夫《易》之作,救乱而作也,圣人不得已也。乱有深浅,故文有繁省。乱萌于伏羲,故八卦已矣;渐于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极于夫子,故极其辞而后能止。”(卷六二七《辨易》)^[1]李觏也认为,圣人作《易》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忧患之心,《易》学的根本是济世救民,他说:“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卷八九九《易论第十三》)^[1]张载则把《易》看作是圣人为天下人制订的根本的行为规范,“圣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书,使人知所向避,《易》之义也。”(第182页)^[4]

二程作为北宋新儒学的中坚,他们把《易》之道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论证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二程把《易》学研究从汉唐儒家经学的训诂、考据之学中解脱出来,明确肯定要研究《易》之道,“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第31页)^[3]二程还对《易》之道与佛教之道作了严格划分,“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分于道也远矣。……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肆恣,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吾道则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圣人于《易》备言之。”(第73—74页)^[3]二程认为,《易》之道并不在现实世界之外,它就体现在君臣、父子的人伦日用之中,是大中至正之道,而佛教把形而上与形而下分为两截,走向空虚寂灭与猖狂妄行这两个极端。

二、作者辨正

北宋时期,儒家学者之间就《易》的作者问题展开论争,关键在如何看待孔子与《易》经、传的关系,其论争过程经历了一个圆圈式发展,即从前期的笼统肯定孔子赞《易》到中期的否定孔子作《易传》,再到后期重新肯定孔子作《易传》。

传统儒家所讲的《易》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易经》、《易传》两部分,汉唐儒家经学的一般观点是,《易经》为伏羲、文王、周公等圣人所作,而孔子既删定《易经》,又作《易传》发明《易经》之道。金君卿在对郑玄、王弼、孔颖达等大儒的说法作比较之后,“以为伏羲画八卦,文王重而为六十四,复系之卦辞;周公述文王之志,又系之爻辞;仲尼赞而为《彖》、《象》、《文言》,为得其实。”(卷一八二六《重卦之人》)^[1]这也是北宋时期一般儒家学者的通行看法。

但到了北宋中期,当时政坛、文坛的巨擘欧阳修却对孔子作《易传》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欧阳修对《易传》七种十篇作了分析,肯定《彖传》、《象传》与孔子的关系,但认为“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卷七三七《易童子问》)^[1]欧阳修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文献比较,如对《文言传》的批评,“童子问曰:‘乾,元、亨、利、贞,何谓也?’曰:‘众辞淆乱,质诸

圣。《象》者，圣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则乾无四德，而《文言》非圣人书乎？’曰：‘是鲁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卷七三七《易童子问》)^[1] 欧阳修认为《文言传》中的一些内容和《春秋左氏传》中记载的鲁穆姜的言论相同，而鲁穆姜早于孔子，所以《文言传》显然不是孔子所作。

欧阳修怀疑孔子作《易传》的观点承袭了中唐以来儒家经学研究中怀疑经、传的学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否定孔子作《易传》对于孔子的圣人权威是一种冲击，也不利于儒家学派借鉴《易》建构形上学以对抗佛、老，所以，欧阳修的观点受到来自儒家学派内部的批评，北宋后期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王安石、二程均对其表示不满。王安石对于欧阳修怀疑经典表示反感，他与宋神宗谈话时说：“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第 1965 页)^[5] 程颐则从文气上断定《系辞传》为孔子所作，他说：“圣人文章，自然与学为文者不同。如《系辞》之文，后人决学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为之者，或有绘画为之者，看时虽似相类，然终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第 240 页)^[3]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之言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程颐解释这段话时认为，这不是说孔子本人有过，而是说《易》书有错，“盖孔子时学《易》者支离，《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他经，惟《易》未尝发明，故谓弟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期之五十，然后赞《易》，则学《易》者可以无大过差，若所谓赞《易》道而黜《八索》是也。”(第 209 页)^[3] 这也是肯定孔子赞《易》的传统说法，反对欧阳修否定孔子作《易传》的观点。

和王安石、程颐直接反对欧阳修的观点不同，有一些儒者承认欧阳修的观点符合事实，但从维护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出发，他们认为欧阳修的观点是有害的，所以不能接受。司马光的后学刘安世就和学生谈到这个问题：“先生与仆论《易》。仆曰：所谓为《文言》者真孔子之所作乎？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盖先儒以此释经也。……仆曰：前辈多不言之，何也？先生曰：此事极系利害，五经其来已远，前辈恐倡后生穿凿之端，故不敢著论，但欲知之尔。若或为之倡，则后生竞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经无全书矣，其害后世多于无立论之时，此前辈所以慎重，姑置之不言可也。”(卷下)^[6]

三、学派论衡

《易》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其中最主要的是象数与义理两大派。被后世儒家学者看作是孔子所作的《易传》主要是谈义理的，其中也有一些象数的因素。两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易》学是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象数之学。而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王弼等人摈斥象数而言义理，但他们所言的义理中又融入了老庄道家思想。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通过对他们之前的《易》学各派的批评，展示了自身的学术取向。

推重象数是北宋前期《易》学的特色，两宋之际的《易》学名家朱震在梳理北宋《易》学源流时，以亦儒亦道的陈抟为源头，把象数《易》学看作是北宋《易》学的主流，他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惇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篇》。”(第 12908 页)^[7] 用象数之学涵盖周敦颐、二程、张载的《易》学显然是不妥的，但象数之学占据北宋前期《易》学主流却是事实。北宋中、后期，象数之学受到愈来愈多的批评，但仍然有一些学者赞同，代表人物有邵雍、刘牧、司马光、朱震等人。邵雍在《易》学上继承了北宋前期陈抟的图书、象数之学，并由数入理。刘牧继承了北宋前期陈抟以来的传统，不仅讲象数，还特别重视《易》图，推演传统的“河图洛书”说画了五十五个图来说明《易》数的变化。司马光对象数之学也抱同情态度，他自己的学术著作《潜虚》就是模仿扬雄的《太玄》而作，属于象数《易》学的范围。司马光为象数之学作辩解，其观点和邵雍非常接近，《温公易说·易总论》中说：“或曰圣人之作《易》也，为数乎？为义乎？曰皆为之。二者孰急？曰义急数亦急。何为乎数急？曰义出于数也。义何为出于数？曰礼乐刑德阴阳也、仁义礼智信五行也，义不出于数乎！故君子知义而不知数，虽善无所统之。”(第 372 页)^[8]

北宋时期，象数《易》学虽然势力很大，但从《易》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看，义理之学愈来愈占上风，象

数与义理之争构成北宋《易》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北宋诸儒大多批评象数之学,认为以象数之学解《易》实际是把《易》看作一部卜筮之书,不符合孔子儒学的人文精神。北宋前期的儒学名臣杨亿虽然深受佛学影响,但在《易》学上,却贬斥沾染道家、道教之学色彩的图书、象数之学,他说:“昔京房作《易占》,焦贲作《易林》,历代宗之,然不过卜筮之说。子云述《太玄》,建立方州部家,虽云准《易》,其如参以星历,颇近术数。”(卷二九一《答陈在中书》)^[1]杨亿的观点代表了北宋大多数儒者的共识。

从批评象数之学的角度出发,一些儒家学者对摈斥象数、重视义理的王弼《易》学持赞赏态度。欧阳修十分推重王弼《易》学,以至与孔子作《易传》等伦,他说:“著数无所配合,阴阳无老少,乾坤无定策,知此,然后知筮占矣。呜呼!文王无孔子,《易》其沦于卜筮乎!《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卷七三一《易或问三》)^[1]同时代的儒学名臣余靖也推重王弼,而批评汉代的象数《易》学,他说:“《易》之道深矣,自汉兴有施、孟、梁丘、京氏、费、高诸家之学,列于庠序。而传异词、师异说,往往入于五行讖纬之术,故其学中绝焉。王氏之学,传自魏晋,盛于隋唐之际,大有言阴阳变化、人事得失,不悖于三圣,不荡于术数,故独为学者所宗。”(卷五六七《宋职方补注周易后序》)^[1]李觏在这一点上也有同感,他赞赏王弼而批评刘牧的图书、象数之学,“观尝著《易论》十三篇,援辅嗣之注以解义,盖急于天下国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因购牧所为《易图》五十五首,观之则益重复。假令其说之善,犹不出乎《河图》、《洛书》、《八卦》三者之内,彼五十二皆疣赘也。而况力穿凿以从俛异,考之破碎,鲜可信用。大惧诬误学子,坏隳世教。”(卷九〇《删定易图序论》)^[1]

以义理之学批评象数之学是北宋《易》学的主流,但在对义理本身的理解上北宋诸儒又产生了分歧,可以说,左批象数、右批以老庄道家思想解《易》的王弼等人,这是北宋儒家义理派《易》学的主流。程颐在批评象数之学时常常援引王弼《易》学,在指导学者研究《易》学时也把王弼注解列为首选,他说:“君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第 613 页)^[3]但一旦论到义理本身,则对王弼《易》学痛加批评,“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第 8 页)^[3]程颐不仅批评王弼以老解《易》,同时对整个汉唐儒家《易》学持批评态度,要求回归孔子赞《易》本意,他说:“自孔子赞《易》之后,更无人会读《易》。先儒不见于书者,有则不可知;见于书者,皆未尽。如王辅嗣、韩康伯,只以庄、老解之,是何道理?”(第 374 页)^[3]

四、通经致用

北宋时期的《易》学在精神气质上仍然秉承着汉唐儒家经学通经致用的传统,但从总体趋势上看,以象数推演现实变化的愈来愈少,而以义理指导社会政治和人生实践的却愈来愈多。

北宋前期的《易》学研究基本局限于汉唐经学注重名物、训诂的大氛围中,但《易》学家们,特别是那些为皇帝讲《易》的学者,常常联系现实的社会政治来阐发《易》理以格君心。宋太祖崇信处士王昭素,而王昭素也以《易》学劝谏,“上令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则敛容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证据,因示风谏微旨。上甚悦,即访以民事,昭素所言诚实无隐,上益嘉之。”(第 243 页)^[9]李觉为宋太宗时的国子监博士,他利用《易》学宣扬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得到宋太宗的认可,“诏觉讲《周易》之《泰》卦,从臣皆列坐。觉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上甚悦,特赐帛百匹。……上谓宰相曰:‘昨听觉所讲,文义深奥,足为鉴戒,当与卿等共遵守之。’赵普顿首谢。”(第 656 页)^[9]

北宋中期尤其是“庆历新政”前后,《易》学研究与社会政治的联系更为紧密。宋仁宗本人就十分喜爱《易》学,并向臣下虚心请教,“御迓英阁,谓讲读官曰,《易》旨精微,朕每以疑难问卿等,得无为烦乎?”(第 1564 页)^[5]宋仁宗喜爱《易》,当时的一些儒学士大夫也重视把《易》学与现实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代表人物有林瑀、贾昌朝、杨安国、胡瑗、李觏等人。

宋仁宗喜爱《易》学很大程度上是喜爱那种推演变化的象数之学,林瑀即投其所好,用《易》学解释灾异,文过饰非,“景祐末,灾异数起,上忧之,深自贬损。瑀言灾异皆有常数,不足忧。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阴阳之变,为上书之。上素喜方术,观瑀书异之,欲迁其官。”(第 3015 页)^[9]林瑀的做法受到正统士大夫的批评,“御史中丞贾昌朝,尝面折瑀所言不经,瑀与昌朝辨于上前,由是与昌朝讎。”(第 3223 页)^[9]贾

昌朝在宋仁宗朝曾为相,他反对林瑀的象数推演,赞同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天人感应论,并以此解说灾异,劝谏皇帝修身进德、修明政治,“太平兴国寺灾,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议修复,昌朝上言:《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近年寺观屡灾,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缮治,以示畏天爱人之意。”(第9614页)^[7]

杨安国的《易》学因袭传统,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发挥,但他能够联系现实讲得生动诙谐,因此深得宋仁宗的赏识。杨安国往往在解《易》时劝谏皇帝知人善任,“尝讲《易》至《鼎》卦,帝问:‘九四象如何?’安国对:‘九四上承至尊,下应初爻,任重非据,故折足覆餗。亦犹任得其人,则虽重可胜,非其人,必有颠覆之患。’帝称善。”(第9828页)^[7]他还引申《易》理,劝谏皇帝修养心性,节制欲望,“讲《易》至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上曰,人之情欲皆生于阴阳,而节之在人。杨安国对曰,臣以为人有六情,喜怒哀乐好恶,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故人之生,天命之谓性,而命,人之所禀以生也,性,人之所赋以分也。言情则性之移也,语欲则情之肆也。故六情相滥则喜生于风,怒生于雨,哀生于晦,乐生于明,好生于阳,恶生于阴。故圣人取损象以惩忿窒欲也。上然之。”(第1562页)^[5]杨安国讲天命之谓性,情出于性,欲是情的放纵,并把人的情感变化与天气变化相比附,这些论述已经接近北宋后期新儒学思潮关心的话题了。

胡瑗、李觏等人的《易》学研究都归本义理、批评象数,讲求经世致用。胡瑗的《周易口义》作为太学的教材,打破汉唐注疏之学的局限,往往联系现实的社会政治来阐发《易》理,但他的特点不是劝谏皇帝,而是面向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特别是面向太学的年轻学子,“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间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谓:‘畜,止也,以刚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赵普相芸祖日,上令择一谏臣,中令具名以闻,上却之弗用。异日又问,中令复上前札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掷于地,中令辄怀归。它日复问,中令仍补所碎札子呈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第15—16页)^[10]这样一种学术风格和教育精神,自然使胡瑗的《易》学获得了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推重,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和胡瑗同在太学任教的李觏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他也十分推崇《易》学的经世之用,明确声称其研究《易》“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卷九00《删定易图序论》)^[1]。李觏作有《易论》十三篇,论述为君、为臣、修己待人之道,为当时的社会提供治平之方,体现出儒学一贯的社会关怀精神。

北宋后期,新旧党争激烈,这一点也体现在王安石与二程有关《易》学的论争之中。王安石作《三经新义》未列《易》,但其早年对《易》十分重视,并有《易解》行世。王安石重视用《易》来为自己的政治改革辩护,他曾与宋神宗论《易》,“又谈至亨而后革,安石曰革已日乃孚,革然后亨,若既亨则安用革耶。”(第2009页)^[5]王安石在君臣关系论上强调相对性,这一点体现在他的《易》学注解中,而程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评。如在《乾》卦九三爻、九四爻的理解上,程颐说:“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怀此心,大乱之道,亦自不识汤、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介甫以武王观兵为九四,大无义理,兼观兵之说亦自无此事。如今日天命绝,则今日便是独夫,岂容更留三年?今日天命未绝,便是君也,为人臣子,岂可以兵胁其君?安有此义?”(第248、250页)^[3]程颐站在维护君臣大义的立场上,批评王安石的君臣关系相对论,把君主的废立从君臣现实的矛盾关系中跳出来而归之于天命,这实际上是对君主权利最大程度的肯定,体现出理学政治思想上的保守性特征。

参考文献:

- [1]曾枣庄,刘琳.全宋文[Z].成都:巴蜀书社,1988—1994.
- [2]胡寅.斐然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3]程颐.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附拾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6]马永卿.元城语录[M].畿辅丛书(第一〇六册)[Z].
- [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郑万耕.易学精华[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0]王得臣.麈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李尚信